学术动态

2014 年清史研究综述

祁美琴　强光美

随着清史百年研究历程的标志性时代的到来和新修《清史》工程的渐进尾声，清史研究领域开始呈现出两个面向，一是回顾与总结，即从主要研究方向上推出宏观、整体、多维、厚重的总结性成果，已经成为学界期待和努力的目标；一是开拓与创新，受惠于清史工程以及相关机构在史料发掘上所做的努力，近十年来大量的稀见文献和原始档案得到整理和出版，新史料的喷涌而出，不仅为日益热火的清史领域各类数据库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更为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和观点的创新，提供了强劲的学术动力。可以说，2014 年的清史学界的学术活动、学术动向和学术成果，无不与此有关。

学术活动评述

2014 年与清史有关的学术活动，主要有专题讨论、主题交流两类。

（一）专题讨论

2014 年 12 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了“清史研究百年学术史”国际研讨会。近年来清史研究所一直重视对既往清史研究成果的回顾与总结，进而推进清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为此成立“清史研究百年学术史”课题组。本次会议邀请了数十位海内外清史名家，以“清史研究百年学术”为主线，以该课题组的研究范围和具体内容为对象，从全方位、多领域回顾和总结了清史研究的百年历程。夏明方“清史研究向何处去”的发言，在梳理百多年来清史书写的发展脉络、主要流派、研究范式以及近年来国内外清史研究的新动向的同时，针对美国“新清史”的挑战与影响提出建设性的反思路径，提倡通过对话寻求共识，既吸收“新清史”研究的有益因素，也要反思自身研究存在的问题，从而构建“新”的中国史书写体系。这次会议为我们更好地探索新时期清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路向，注入了活力。而此前一个月，由黄爱平主持的该项目中期成果《清史书目》的出版以及出版座谈会的召开，则可视为这一年学术总结与回顾的标志性成果。

2014 年 9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甲午战争与东亚历史进程——纪念甲午战争 12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威海开幕，150 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香港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海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韩国新罗大学史学科教授裴京汉、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原副司令丁一平，分别以《甲午战争与中日关系——战争爆发 120 年后的反思与检讨》、《〈马关条约〉与台湾法律地位的再探讨》、《从

[收稿日期] 2015 - 9 - 13
[作者简介] 祁美琴（1964—），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2，qimeiqin98@126.com；强光美（1988—），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qgm03@126.com

“海防”到“海权”：甲午战争 120 周年的省思》、《和平之路与战争之路——1880 年前后时期中日两国“东亚连带”的探索与挫折》、《对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术问题的分析》作大会主题报告，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甲午战争的历史背景和起因、甲午战争前后的国际关系、马关条约谈判、东亚海权问题、中日海军战略、历史人物研究、甲午战争对中日关系及东亚格局的影响等主要议题展开研讨，总结和反思甲午战争对百余年来中日两国及亚洲地区的影响。

（二）主题讨论

主题讨论是反映 2014 年学术热点的一面镜像，值得关注的会议主题有:

一是传教士与中西交流史研究。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成功举办了“全球视野下的明清天主教研究”工作坊，该中心还与土耳其海峡大学孔子学院、历史系、亚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儒家、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相遇：晚期奥斯曼帝国和帝制中国晚期的传教士”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举办了“全球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国与世界基督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俄罗斯宗教研究院、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主办“传教士在远东”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会议提交的文章多从清代历史出发，强调“全球化”的考察视野，极大地推进了清代传教士与中西交流史研究。

二是经济社会研究。2014 年 11 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台北中研院相继举办了“清代财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清代商业网络”工作坊，讨论的问题涉及财政、税收、商铺、会馆、捐输、治河经费、煤炭开采、兵饷、官商关系、商业网络、社会变迁等，反映了学界对清代财政与商业社会的研究热情和趋向。

三是法制史研究。9 月 5 日至 6 日，由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明清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集中在明清中国的“法律”变迁方面，与会学者探讨了不同的“法律”现象，如“国家法典、定罪量刑、审判推理、法律知识、司法从业人员、官员晋用与考成、国际外交规则、契约、产权观念、习俗、礼教、对性别与族群差异的预设（default）、乡约民规、宗族家法、商业规则、民间借贷、货币交易”，以此检视这些广义的“法律”现象如何与明清中国的“社会变迁”相互影响。5 月 22 日至 23 日，“明清中国的刑律与日常司法”研讨会在巴黎举行。该研讨会系法兰西学院与法国国家科研署主导、由巩涛教授执行的“中国空间法制化”课题组合办。该研讨会旨在收集和分析中华帝国晚期司法如何当场实施和感知的具体案例，以及研究基于惩处类别属性构造的成文法如何处理实际社会生活的多种境遇。在此指导原则下法国学者召集了一系列研讨，并建有专门网页。

四是清末新政与近代变革研究。7 月 17 日至 18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了“‘清末新政·边疆新政与清末民族关系’暨第六届晚清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八十余人，议题包括边政与边疆、改革与革命、实业与财政、科举与教育、法律与法制等。这是一次就晚清边疆社会各面向进行全面研讨的盛会，也是清末新政与晚清社会变革研究热点在边疆民族史研究领域的回应。

政治史研究

2014 年的清代政治史研究，接续着辛亥革命百年和清亡百年的重大历史节点的纪念和研究热忱，并寻求在近代史话语体系之外，考察晚清时代的历史走向和社会变革及其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和意义。因此本年度政治史的研究成果的亮点集中体现在晚清政治方面，此外在机构制度、基层法律以及重大事件的深入剖析方面的研究也有令人惊喜的突破。

晚清政治　对晚清政治的关注，首先体现在对晚清重要人物的重新审视上，尤其是慈禧、载沣、袁世凯、康有为等晚清重要政治人物，成为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将这些人物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或时代背景相勾连，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深入剖析。李细珠从个体生命史、清史、改

革史等角度对慈禧的一生进行了解析，认为她的统治是一种典型的“老人政治”模式，靠的是老辣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政治手腕，实质是一种隐性专制政治。① 张华腾考察了袁世凯与清末新政的关系，认为袁是新政的实际发起者和领导者，他创造了新政的最大成果——北洋新军，北洋集团也随之崛起，成为清末最大的政治势力。② 李学峰梳理了载沣在铁路政策上的三大失误：一是在张之洞死后错误地支持了湖南、湖北二省的拒债废约运动；二是在干路国有政策的出台上决策过于草率，且支持了不适当的还股方案；三是迷信军事，对保路运动一味压制，最终导致局势失控。③ 张星久从思想家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康有为，颠覆了以往将其视为保守派的观点，认为康虽然在政治行动上“保皇”，但在思想上却支持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观念。④ 马忠文重新梳理了维新志士王照的“自首”问题，并着重分析了王照与康、梁及戊戌变法的复杂关系，指出王照与康、梁的变法主张颇有相通之处，但他倡导渐进式改革，与康、梁的激进路线格格不入，因此政变后分道扬镳。他在流亡日本期间的一次笔谈揭露了康、梁伪造密诏的内幕，证明光绪帝并未参与“围园”密谋，获得朝野各界的广泛共鸣，从而使其庚子年回国隐居及后来主动投案成为可能。⑤ 盛宣怀、李鸿章、严复、郑观应、聂士成、刘坤一、怡良、冯镜如、杜冠英等政治人物也都得到关注。⑥ 另外，一些特殊的人物群体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如田宓对近代转型时期出现的“蒙古青年”这一少数民族青年学生群体的身份建构过程和集体命运进行了探讨。⑦

清季变革则是晚清政治研究的重心。樊学庆《辫服风云：剪发易服与清季社会变革》（三联书店），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追寻、重建清季剪发易服史事，考察了清廷中枢、改良派、革命派、立宪派、新军、巡警、学界、民众等不同群体对于剪发易服的态度和立场，将清末新政、预备立宪、辛亥革命期间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之相勾连，从而透视晚清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巨变。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采用“阅读笔记”的写作方式，利用新近阅读到的《张之洞档案》，对戊戌变法这一重大史事的诸多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作者认为，以往关于戊戌变法史的研究多围绕康有为、梁启超及其留下的史料展开，而《张之洞档案》的发现，可以为该研究提供新的角度，从而看到戊戌变法的“另面”。

在清季变革的诸多内容之中，清末新政最为学者关注。本年度对清末新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法制领域，现代化依然是主要的考察视角。钱锋将清末立宪运动视为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端，理由有四：第一，立宪运动有别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历次变法运动，它立足于体制上的根本变革；第二，立宪运动法律救国的模式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主要模式；第三，立宪运动反映了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更新，即跳出了传统的华夷之辨、义利之辨、体用之变；第四，它是晚

---

① 李细珠《一个人与一个时代——论慈禧太后及其统治的是非功过》，《安徽史学》2014 年第 3 期。
② 张华腾《袁世凯与清末新政》，《历史教学》2014 年第 4 期。
③ 李学峰《载沣与清朝末年的铁路政策》，《史学月刊》2014 年第 8 期。
④ 张星久《康有为与清末帝制合法性危机》，《武汉大学学报》2014 年第 2 期。
⑤ 马忠文《维新志士王照的“自首”问题》，《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3 期。
⑥ 相关成果有王志刚《论盛宣怀与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史学集刊》2014 年第 4 期；安东强《张之洞与晚清科举考试风气》，《暨南学报》2014 年第 7 期；翁飞《李鸿章的海防思想与海军建设——两次海防大筹议过程探讨》，《学术界》2014 年第 10 期；刘晓琴《严复与晚清留学生归国考试研究》，《南开学报》2014 年第 1 期；戴海斌《再论“东南互保”时期的郑观应》，《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 年第 3 期；丁希宇、刘奎《聂士成朝觐及出生日期考》，《历史档案》2014 年第 4 期；李博强《刘坤一与晚清两淮盐政改革》，《盐业史研究》2014 年第 1 期；倪玉平《怡良与两淮盐政改革》，《盐业史研究》2014 年第 3 期；邹振环《清末政治与文化漩涡中的冯镜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 年第 3 期；朱晓凯《镇海战役中的杜冠英》，《安徽史学》2014 年第 5 期；李志茗《彭玉麟：兵事之外的才识操守》，《史林》2014 年第 1 期。
⑦ 田宓《“蒙古青年”与内蒙古自治运动》，《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5 期。

清最广泛的一场社会运动。① 李在全同样关注了司法领域内的改革，但观点略有不同。他利用晚清京官唐烜的日记，以其对光绪三十二年的丙午官制改革前后时局的观察和感受为主线，再现了清末司法体制改革中刑官到推事的转变过程及亲历者的因应。面对司法变革，唐烜除有意识地了解些许新式法政知识外，主动因应这场变革的意识与举动并不多。官制改革后，身为推事的他仍属刑官之范畴，其知识主体依旧是传统律学，司法推理、审案方式也变化无多。作者由此指出，政治体制的变革与新式司法制度的引进，产生了“新式”司法官，但这只是职业身份的变化，而实质上的转变则是渐进的、缓慢的，丙午官制改革仍然是清朝体制内的改革。② 刘国媛、蔡杰则从清末监察制度的创立分析了法制变革的阻力，认为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利益相关者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如何协调与平衡他们的利益关系是决定法制变革成败的关键。③ 李贵连、刘鹗通过对一份清末湖北官立法政学堂毕业凭照的研读，针对新政期间向在职官员推广西式法政知识的法政学堂自修科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④ 朱淑君以疆臣施政为切入点，通过考察清末重要疆臣赵尔巽任职湖南期间的改革实践，指出赵氏试图通过吏治整肃、学堂推广、教化变革等手段，达到变革与控制基层社会的双重目的，体现了清末新政的复杂意义。⑤

机构制度　制度、机构及其运作是清史研究的传统重镇，但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毛亦可介绍了“乌布”（满语“ubu”，特指六部司官在部内担任的工作）的涵义、具体名目及其发展演变，深化了对六部司官及其行政运作的认识。⑥ 此外，刘文华对京内奏折及其处理方式的探讨⑦、傅林祥对清代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得名的时间与方式的考证⑧、徐雪梅对满汉官员丁忧制度的梳理及分析⑨等文，均不同程度地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学术进步。司徒安《身体与笔：18世纪中国作为文本/表演的大祀》（北京大学出版社），对18世纪中国的王朝礼仪——大祀加以深入分析，揭示了礼仪对于王权的宣示和强化作用。

法制史　法制史研究多采用个案分析的方式，徐忠明、杜金《谁是真凶：清代命案的政治法律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要通过对具体案例审理、平反细节的考察，揭示案件背后的黑幕与暗箱操作，解读其政治背景与社会文化内涵。胡祥雨通过嘉庆帝对一起宗室犯奸案件的审判，指出在道德与法律之间，皇帝更倾向于道德，但他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制于儒家伦理。⑩ 此外，个案性的研究还有刘芳《清末载公府与嵩祝寺互控地亩案探析》（《历史档案》2014年第2期）、胡祥雨《清代“家长奸家下人有夫之妇”例考论——满、汉法律融合的一个例证》（《法学家》2014年第3期）。

清代州县一级的司法实践是近年来法制史研究的热点，本年度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不在少数。俞江阐述了清代州县细故案件的审理模式，将其归纳为：审、调分离，边审边调，调、审衔接。⑪ 吕宽庆主要分析了州县官在法律适用和维护地方秩序上的方式方法，他们在司法时始终以行政官的面貌出现，其对德化“教养”和秩序的强调，是与行政权的内在诉求相一致的。⑫ 王兆

---

① 钱锋《清末立宪运动：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端》，《复旦学报》2014年第3期。
② 李在全《亲历清末官制改革：一位刑官的观察与因应》，《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
③ 刘国媛、蔡杰《从清末检察制度的创立谈法制变革的阻力》，《武汉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④ 李贵连、刘鹗《清末法政学堂自修科考》，《清史研究》2014年第2期。
⑤ 朱淑君《变革与控制：赵尔巽主政湖南的着力点》，《中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⑥ 毛亦可《清代六部司官的“乌布”》，《清史研究》2014年第3期。
⑦ 刘文华《谈京内奏折的处理及朱批、录副奏折的构成问题》，《清史研究》2014年第4期。
⑧ 傅林祥《清代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得名的时间与方式》，《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⑨ 徐雪梅《清朝丁忧制度中的满汉畛域》，《历史教学》2014年第22期。
⑩ 胡祥雨《嘉庆帝对一起宗室犯奸案件的审判》，《历史档案》2014年第3期。
⑪ 俞江《清代州县细故案件审理的法律史重构》，《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
⑫ 吕宽庆《清代州县官司法问题探析》，《中州学刊》2014年第3期。

辉、刘志松从律例规定、勘验权、审断权、监管权、代监权等方面对清代佐贰官的司法权进行了论述。① 朱声敏则考察了州县司法实践中的门丁之弊。② 邓建鹏对清代司法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反思，认为已有研究在时间、空间和参与者三大关键要素方面存在问题，空间上局限于汉族地区而忽视了边疆，时间上多做静态化处理而忽视了司法变化，参与者方面多关注讼师而忽视了其他大部分参与者，并提出解决途径，即进一步拓宽资料利用的广度，对清朝的司法做整体、宏观的把握。③

政治事件　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成为学者研究清代政治的突破口。刘文鹏《盛世背后：乾隆时代的伪稿案研究》（人民出版社），通过梳理皇帝口谕、大臣奏折、档案口供等材料，试图再现乾隆十六年至十八年间“伪孙嘉淦奏稿案”追查的全过程，同时捕捉皇帝、大臣、民众在这场政治运动中的心态，最终揭示出盛世背后尖锐的社会矛盾。邱涛、郑匡民以庚子围攻使馆之役中最为激烈和重要的肃王府之战为考察对象，通过中、日、英档案史料互证，还原战役中的诸多细节，进而对围攻使馆之役是否为真打、清政府的决策及对战争态度的演变、战斗的具体状况、慈禧和荣禄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讨论。④ 刘增合通过对咸丰朝军饷筹解新制运作的特殊形式联省合筹的考察，以探究晚清军政制度的转变、晚清战时中枢与外省及省际间的互动情态，揭示制度转换中新规旧制混合运作的状态。⑤ 马忠文梳理了丁未政潮后梁鼎芬参劾奕劻、袁世凯事件原委，以揭示其政治内幕与实情。⑥ 雷冬文从粮食这一微观角度切入，分析其对咸同会党起义的影响，指出粮食是一些地区发动起义的直接诱因，起义过程中，粮食又成为交战双方消灭对手的重要工具。⑦

中外关系史研究

本年度的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发表的文章有五六十篇，其中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中日关系、藩属关系和以传教士研究为核心的中西关系上。

中日关系　关于清代中日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甲午战争展开。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使近代中国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2014 年的清史研究在纪念“甲午战争”120 周年中沉思，掀起了一股甲午战争研究的热潮。8 月，三联书店出版《甲午：120 年前的西方媒体观察》一书，收集了 1850—1895 年英、法、美、俄、日等国十几种报刊对于甲午战争的关注和报道，其中有大量图片资料，生动呈现了当时的社会实况。田庆立、宋志艳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了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思想根源、甲午战争对日本国民意识的影响及对中国的冲击。文章认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思想根源在于其近代以来海权意识的不断膨胀，同时，战争也成为其构建近代国民国家的逻辑起点，刺激了日本进一步向海外扩张的野心，形成了“蔑视型”的“甲午史观”。而甲午战争对于中国，一方面打乱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则从思想观念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国人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革。⑧ 戴鞍钢从经济史的角度，以沪苏杭为例，探讨了甲午战争对中国地区经济社会的冲击。⑨ 徐碧君则从法律史的角

---

① 王兆辉、刘志松《清代州县佐贰官司法权探析》，《西南大学学报》，2014 年第 4 期。
② 朱声敏《清代州县司法实践中的门丁之弊》，《学术论坛》2014 年第 7 期。
③ 邓建鹏《清帝国司法的时间、空间和参与者》，《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 年第 3 期。
④ 邱涛、郑匡民《庚子肃王府之战》，《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3 期。
⑤ 刘增合《咸丰朝中后期联省合筹军饷研究》，《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
⑥ 马忠文《丁未政潮后梁鼎芬参劾奕劻、袁世凯史实考订》，《历史教学》2014 年第 20 期。
⑦ 雷冬文《粮食与咸同之际会党起义》，《历史档案》2014 年第 3 期。
⑧ 田庆立、宋志艳《甲午战争对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2014 年第 6 期。
⑨ 戴鞍钢《日本与甲午战争后的沪苏杭》，《安徽史学》2014 年第 4 期。

度，分析了甲午战争国际法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① 多位学者从认知史的角度讨论了甲午前日本人认识中国的途径、内容及影响。李长莉通过对 1875 至 1888 年间的日本出版的四部中国考察地志纪行书的梳理，分析了当时日本人看待中国社会的眼光和心态，及其对日本人的中国观与甲午战争的影响。② 郭海燕则以《朝日新闻》报道李鸿章及清军动向为中心，探究了甲午宣战前日本报刊对中国报道的内容、形式，指出这些报道成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的主要途径，也是其形成具体的中国认识的主要基础。③ 还有学者研究了甲午战争的相关历史人物。侯杰、王小蕾关注了战争亲历者李鸿章对战争结果的反思，李在战争失利后开启了欧美八国之行，一面反思教训，一面为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是并未成功。④ 刘文明考察了战争中的英美特派记者与旅顺大屠杀真实性争论的关系，指出多数亲历旅顺大屠杀的英美战地记者对此事件进行了真实报道，但亦有少数记者如盖维尔等人为日本收买操纵，或由于记者间相互竞争原因而否认屠杀事件并反驳有关报道，使得旅顺大屠杀真相在英美的亲日舆论环境中受到了怀疑，从而造成了争论。⑤

清朝与周边属国关系　权赫秀通过台湾藏 1888 年中朝《元山口华商新界暂拟章程》及 1894 年聂士成考察朝鲜期间所撰《朝鲜元山海口说》两则新史料，探讨了晚清时期中国在朝鲜元山的势力。⑥ 尤淑君关注了 1890 年由朝鲜赵太妃之薨引发的中朝“郊迎礼”之争，指出朝鲜欲模糊宗藩体制的等差位阶，而清政府则欲借“郊迎礼”向各国驻朝公使彰明两国的君臣名分，稳固宗主权。最终清朝虽赢得成功，却强化了朝鲜的反华意识，埋下了日后中朝宗藩关系破裂的导火线。⑦ 何新华、石家铸细致梳理了发生在雍正三年至六年间的中越赌咒河边界争议的背景、过程、结果，指出清廷在边界处理上以传统宗藩理论为指导，且地方大吏和军事威慑在处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⑧ 孙宏年考察了 1868—1869 年越南阮朝黎峻使团来华的背景、行程，认为此次朝贡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朝贡贸易”，而且具有传承与嬗变的双重特点。朝贡是在双方均遭到西方侵略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产生了一些新变化，越南使者关注中国、朝鲜遭受列强侵略的情况，注意到清朝对于“同文诸国”和“洋人”不同的外交体制，强调中、越、朝“同文”，隐约地希望能够找到抵抗外国侵略的办法。由于他们不敢向中国方面透露法国侵略越南的情况，中、越两国对各自国家情况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中国与法国交涉越南问题时的被动。此外，中、越、朝等国通过文化交流形成“同文诸国”之间的“文化认同”，并联合起来争取民族解放。⑨ 柳岳武探讨了嘉庆至同治时期的中廓宗属关系，指出此一时期清朝由盛转衰，直接导致其应对中廓交涉时的无力，由此暴露出清代宗属体制的严重弊端——运作状况以王朝盛衰为转移，宣传与实际相背离。⑩

杨煜达的专著《乾隆朝中缅冲突与西南边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摒弃以往单纯从王朝视角或民族—地方社会变迁的本土视角考量边疆问题的方法，而尝试使用“边疆控制”的系

---

① 徐碧君《论甲午中日战争国际法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清华大学学报》2014 年第 6 期。
② 李长莉《甲午战争前日本人看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战线》2014 年第 4 期。
③ 郭海燕《有关甲午战争宣战前日本报刊对中国报道的研究——以〈朝日新闻〉报道李鸿章及清军动向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4 年第 10 期。
④ 侯杰、王小蕾《李鸿章对甲午战争的反思——以 1896 年欧美之行为例》，《南开学报》2014 年第 6 期。
⑤ 刘文明《甲午战争中的英美特派记者与旅顺大屠杀报道》，《社会科学战线》2014 年第 10 期。
⑥ 权赫秀《从两则新史料来看晚清时期中国在朝鲜元山的势力》，《安徽史学》2014 年第 1 期。
⑦ 尤淑君《从赵太妃之薨论清政府对朝鲜的名分控制》，《清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
⑧ 何新华、石家铸《清代雍正三至六年中越赌咒河边界争议研究》，《东南亚研究》2014 年第 3 期。
⑨ 孙宏年《传承与嬗变：从黎峻使团来华看晚清的中越关系——兼议清代东亚“国际秩序”的虚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 年第 2 期。
⑩ 柳岳武《嘉庆至同治时期的中廓宗属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 年第 2 期。

统分析法，对乾隆朝中缅冲突的起源、开始、扩大、解决、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作者指出，环境、成本与边疆控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贯穿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和巩固的全过程，但我们对具体环境要素的认识还不够充分，边疆史地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大环境要素对于边疆演进的影响及其机制的探索。

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　传教士是中西交流的重要媒介，也是学界一直关注的热点。本年度关于传教士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领域:

第一，皇帝与传教士。白雅诗将耶稣会士医学与奏折制度相勾连，通过分析满汉文医学奏折，解析其中蕴含的政治权力问题。① 冯尔康阐述了康雍乾三帝天主教非“伪教”观及相应政策，分析了康熙帝多方使用西士的原因。② 汤开建细致考证了雍正教难期间驱逐传教士至广州事件的始末，包括雍正元年禁教后西方传教士在全国的流动与分布、传教士先被驱逐至广州后到澳门的过程、广州男女八座天主教堂的源流、堂主、所属修会等问题。③

第二，传教士与中西礼仪之争。张先清针对康熙三十九年传教士闵明我领衔上奏答复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的复函事件展开讨论，指出此事件不仅引发康熙帝第一次就中国礼仪问题公开表达立场，还清楚地展示了清初耶稣会士如何巧妙地利用皇权与朝臣网络来应对礼仪之争的困局，进而表明康熙时期耶稣会士已然建立起稳固的朝臣人脉关系网络，为其传教活动提供必要的社会资源。④ 李媛梳理了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祭礼问题的讨论，指出他们对中国祭祀礼仪多以白描式的介绍为主，关注对象为祭天、祭祖、祀孔、祭城隍及某些民间生活中的私人祭拜活动，对制度化的国家祭礼不甚关注，此外，耶稣会士内部对中国祭祀礼仪的态度也并非完全一致。⑤ 张振国介绍了天主教对中国世俗迷信如预测命运及吉凶之术、风水信仰、择吉习俗、巫术等的具体批判。⑥

第三，传教士的社会活动。肖玉秋研究了晚清民国时期俄国驻北京传教团的办学活动，指出他们的办学事业发展缓慢，由于俄国政府对在华传教投入不足、学校办学目的单一、缺乏有效管理等原因，俄国教会学校无力与西方教会学校、新式学堂竞争。⑦ 崔铭、张婷以《尚学堂（新学）月报》为例，考察了戊戌变法时期北京传教士办报活动的兴衰。⑧ 董少新向学界介绍了17世纪来华耶稣会中国年报的概况及史料价值。⑨ 许晓冬专门探讨了美国传教士与早期中美贸易的关系，包括传教士与美国商人的关系、传教士鸦片贸易观念的分化、传教阵营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诸问题，认为传教士的身份与作用多元化，是美国东亚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⑩ 陈利敏则研究了晚清洋商与传教士在广州文教领域的互动。⑪

帝国主义侵华史是中西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郭道平考察了庚辛之际联军占领北京后在治安、卫生、公共设施等方面的具体治理措施以及京师民众的典型心态，指出京师居民从高层官

---

① 白雅诗《康熙宫廷耶稣会士医学: 皇帝的网络与赞助》，《清史研究》2014年第1期。

② 冯尔康《康雍乾三帝天主教非“伪教”观与相应政策》，《安徽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康熙帝多方使用西士及其原因试析》，《安徽史学》2014年第5期。

③ 汤开建《雍正教难期间驱逐传教士至广州事件始末考》，《清史研究》2014年第2期。

④ 张先清《皇帝、朝臣、传教士: 耶稣会士闵明我与清初礼仪之争的一段插曲》，《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⑤ 李媛《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祭礼问题的讨论》，《山西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⑥ 张振国《明末清初天主教对中国世俗迷信的批判》，《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⑦ 肖玉秋《1917年前俄国驻北京传教团办学活动研究》，《暨南学报》2014年第7期。

⑧ 崔铭、张婷《戊戌变法时期北京传教士办报之兴衰——以〈尚贤堂（新学）月报〉（1897—1898）为例》，《河北学刊》2014年第3期。

⑨ 董少新《1 7 世纪来华耶稣会中国年报评介》，《历史档案》2014年第4期。

⑩ 许晓冬《传教士与早期中美贸易关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⑪ 陈利敏《晚清洋商与传教士在广州文教领域的互动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吏、中下层士绅到底层民众都经历了一个从惊恐到逐渐适应，甚至生出好感的心理变化过程。联军的长期统治尤其是紫禁城的部分开放还潜在地影响了士民的帝国、君臣传统观念，并在客观上对北京城市乃至中华帝国的现代转型起到了催化作用。① 郭卫东考察了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设计的广州外交体制从设立、困顿到瓦解的全过程，此后清朝外交中心逐步北进和上移，直到总理衙门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外交机制的初建和外交机构从地方到中央的转变。② 赵剑锋系统阐述了俄国驻新疆各领事馆的建立时间、机构设置、职责及对新疆社会的影响，指出这些领事馆实为俄国在新疆进行侵略活动的指挥机构，俄国借驻新疆领事馆向新疆政治、经济领域渗透，攫取政治权利和高额利润。③ 此外还有周育民④、裴广强⑤等人的文章。

从观念史、认知史的角度研究中外关系的成果也十分丰富。阿拉腾奥其尔通过早期中俄两国接触和交往的史实，考述了“罗刹”和“俄罗斯”名称的来源，并从称呼的演变来考察清人对俄罗斯认识的发展过程。⑥ 叶柏川描述了俄国来华使臣对北京城市、紫禁城里的朝廷及中国社会百态的印象，他们用自身文化价值观评判北京城，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带有欧洲文化优越论的烙印。⑦ 潘崇考察了欧美各国和日本媒体对清末五大臣出洋的观察和反应、外媒对考察团出洋期间的报道和评论，分析了清末宪政改革初期的国际舆论环境及五大臣出洋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的地位。⑧ 杨早阐述了中国官绅代表杨芾、王景禧、许炳榛等人对日本商务、教育、警政及政治、社会生活各层面的考察和态度，指出他们在经历了甲午战败、庚子事变和日俄战争之后，看待日本的眼光由仇恨转变为褒扬，并试图移植日本的先进经验。⑨

经济史研究

中外贸易　郭卫东指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化的外来原料输入是印度棉花输入，表明鸦片战争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东方产品”而不是“西方产品”在中国行销走俏。中国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藉此首次与海外产品相结合，与国际市场相联接。⑩ 陈勇勤尝试将鸦片输入和洋布洋纱进口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讨论，以期为洋货进入中国市场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⑪ 马光利用新近刊布的近代海关史料，阐述了 1858—1911 年间珠三角地区鸦片走私的渠道、数量、参与者、组织形式以及广东地方政府和海关当局的缉私行动。⑫ 此外，王涛对清代广州对外贸易中的引航制度的介绍⑬、王天根对中英开平矿权纠纷的剖析⑭、薛明对康熙中后期内务府商人赴日办铜的利润问题的讨论⑮等，都是该领域值得关注的学术前沿成果。

---

① 郭道平 《庚子之变中的联军统治与国人心态》，《北京社会科学》2014 年第 4 期。
② 郭卫东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外交体制的变迁》，《北京社会科学》2014 年第 2 期。
③ 赵剑锋 《晚清俄国驻新疆领事馆考述》，《新疆大学学报》2014 年第 4 期。
④ 周育民 《鸦片战争以后的五口开埠问题》，《清史研究》2014 年第 3 期。
⑤ 裴广强 《英法联军第一次火烧圆明园诸问题再考》，《北京社会科学》2014 年第 6 期。
⑥ 阿拉腾奥其尔 《从“罗刹”到“俄罗斯”——清初中俄两国的早期接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 年第 1 期。
⑦ 叶柏川 《17—18 世纪俄国来华使臣眼中的北京城》，《历史档案》2014 年第 4 期。
⑧ 潘崇 《外国媒体对清末五大臣出洋的观察与反应》，《历史档案》2014 年第 4 期。
⑨ 杨早 《文明国游记——1903－1907 年中国官绅眼中的日本》，《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 年第 2 期。
⑩ 郭卫东 《印度棉花：鸦片战争之前外域原料的规模化入华》，《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5 期。
⑪ 陈勇勤 《19 世纪 60—90 年代鸦片、洋布洋纱输入和相关国情》，《安徽史学》2014 年第 1 期。
⑫ 马光 《1858—1911 年珠三角地区鸦片走私与缉私》，《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6 期。
⑬ 王涛 《清代广州对外贸易中的引航制度》，《历史教学》2014 年第 6 期。
⑭ 王天根 《面子与法理：中英开平矿权纠纷及赴英诉讼》，《史学月刊》2014 年第 12 期。
⑮ 薛明 《康熙朝中后期内务府商人赴日办铜的利润问题》，《清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

财政赋税问题　陈国栋《清代前期的粤海关与十三行》（广东人民出版社），系统介绍了清代粤海关的监督派遣、行政体系、税务行政、利益分配等问题，以及十三行的经营情况，并分析了皇帝、内务府与粤海关的关系。赖惠敏《乾隆皇帝的荷包》（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围绕乾隆时期的皇室财政展开，并讨论了与之相关的宗教、贸易、税收等问题。Helen Dunstan "The Finance of Imperial Munificence: How Simple Quantitative Work Can Help Us Rethink High-Qing History"（*T'oung* Pao，Vol. 100，Iss. 1－3），以1746－1748年乾隆帝第一次减免赋税时省级财政部门的应对为例，考察了乾隆时期地方财政系统及其运作状况。刘增合研究了清末新政时期的财政改制问题，他的新作《"财"与"政"：清季财政改制研究》（三联书店）主要围绕光绪前期的财政制度兴革、新政期间的清理外省财政、外省财政机构变动、试办预算制度、税政制度的合理化变革等问题展开讨论，挖掘财政规制变动背后的潜因，分析政治、财政、知识观念在清季大变动中的交互影响。此外，余开亮、穆崟臣分别研究了清代粮价细册制度和收成奏报制度。① 康春华探讨了云南厘金的开征时间、税种税率、抽收机关、财政地位。② 李光伟系统梳理了晚清钱粮征信册制度的创制、渊源、实施及困境，并剖析了其隐含的官民关系及失败原因。③ 晏爱红厘清了漕项这一漕运重要概念的内涵，考证了漕项的构成、数额、征解、考成及演变诸问题。④ 贺茹等人研究了清代农贷政策的演变、偏向和绩效问题。⑤ 滕德永讨论了清代内、外财政部门户部与内务府的复杂财政关系。⑥

不少学者关注了晚清经济走向和清政府的宏观调控问题。朱荫贵从民间和官方两个层次分析近代中国经济制度改变的内在动因。⑦ 张世慧通过对政府救济行为及其中各方利益纠葛的阐述，探究政府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指出清季政府职能开始扩展，从政治领域深入到经济领域，并发挥调控、稳定经济的作用。⑧ 柴荣考察了各级政府对于田皮交易的不同态度和不同程度的监管。⑨ 邓亦兵则关注了清前期政府对京城房产经营的管控。⑩

学界对嘉庆道光年间由银贱钱贵转为银贵钱贱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霍晓荣利用数据对道光朝银贵钱贱的原因进行再分析，认为在显示的众多因素中，只有人口对银钱比价存在显著影响，人口的迅速增长是银贵钱贱的主要原因。⑪

灾赈史研究　朱浒认为当下流行的将清代备荒仓储发展脉络归纳为"国退民进"过程的观点存在明显缺陷，应从国家视角审查之，清代仓政的演变不仅贯穿了清朝的兴亡，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致可分为顺康时期政策驱动的常平仓独大、雍乾时期国家掌控的三仓（常平仓、社仓、义仓）体系、嘉道时期调整权限后的义仓建设、同光时期官方督导下的积谷运动四个阶段。⑫ 周琼试图改变学界长期以来只关注制度内赈济而忽视制度外赈灾机制及其实践的状况，梳

---

① 余开亮《粮价细册制度与清代粮价研究》，《清史研究》2014年第4期；穆崟臣《清代收成奏报制度考略》，《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② 康春华《晚清厘金与云南财政变革》，《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③ 李光伟《晚清赋税征缴征信系统的建设》，《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

④ 晏爱红《漕项考释》，《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

⑤ 贺茹、杨乙丹、朱宏斌《清代农贷政策的演化、偏向与绩效分析》，《农业考古》2014年第1期。

⑥ 滕德永《清代户部与内务府财政关系探析》，《史学月刊》2014年第9期。

⑦ 朱荫贵《晚清社会经济制度之改变：从内在角度的考察》，《清史研究》2014年第2期。

⑧ 张世慧《清季政府与区域性经济危机的应对——以东盛和倒闭案为中心的研究》，《清史研究》2014年第6期。

⑨ 柴荣《明清时期田皮交易契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⑩ 邓亦兵《清代前期政府与京城房产市场》，《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⑪ 霍晓荣《嘉庆道光年间的银贵钱贱与政府的货币政策》，《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⑫ 朱浒《食为民天：清代备荒仓储的政策演变与结构转换》，《史学月刊》2014年第4期。

理了清代对“勘不成灾”进行赈济并将其制度化的历程及影响。① 此外，水灾及其救助措施最受学者关注，相关论文有叶瑜等人《1801 年永定河水灾救灾响应复原与分析》②、成赛男、杨煜达《1840 年长江三角洲水灾的时空分布与社会响应》③、陈亚平《保息斯民：雍正十年江南特大潮灾的政府应对》④、袁飞《光绪三十二年苏皖水灾中的救济差异及皖北困境》⑤ 等。

社会史研究

地域与环境　吴滔、佐藤仁史著《嘉定县事——14－20 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书，以嘉定县为中心，综合考察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赋役、财政、市场、水利、地方行政等问题，尤其关注赋役财政制度的变迁，以及江南地区市场的发育机制。郝平《大地震与明清山西乡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一书是灾荒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作者分别论述了明嘉靖三十四年华州大地震、清康熙三十四年临汾大地震、嘉庆二十年平陆强地震的灾情、救灾措施、震后灾区恢复重建等情况，着重探讨地震对区域社会发展与变迁的作用及影响。吕君丽、陈恩虎研究了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水资源环境和塘坝兴修。⑥ 张健、张俊辉、吕卓民等人采用量化方法评估了 1751—1911 年黄河中下游决溢程度与气候波动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黄河中游降水变化与中下游河流决溢及洪涝灾害事件的变化基本同步，从而认为清中后期气候波动对黄河决溢及洪涝灾害的发生有着重要影响，中下游决溢主要受中游降水异常偏多所致。⑦

城市史　关于近代城市化问题，罗威廉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城市化持续进行，但主要发生在城市层级机构的低端。城市化带来人口的流动，机构复杂的城市社会和城市经济也带来了大规模的私有和半公共性质的社团建构浪潮，极大地增强了市民自我管理能力并最终使城市人口产生了与政府相疏离的感觉。⑧

近代城市管理方面，罗晓翔《明清南京内河水环境及其治理》是一篇将水利史与城市史、环境史相结合的代表作。文章试图从长时段考察城市水环境的变化及治水模式的变迁，介绍了南京秦淮水系、水患与水污染，从气象、地理及城市生活、水关管理等方面分析了造成水患与污染的原因，进而考察了治河的主持机构与经费来源、治水的局限与困境。作者指出，南京水环境的恶化，一方面体现了传统城市管理模式的缺陷，一方面也暴露出城市生活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早在工业化之前就已经存在。此外，作者还指出，在缺少市政机构的前近代城市，城河事务的管理机构由该城的行政级别决定，体现出较强的官办性质，折射出中国城市近代化转型的艰难。⑨

还有学者讨论城市人口与城市空间等问题。张力仁认为以往统计历史城市人口的方法有很大缺陷，检验文献记载的疑似城市人口数据合理与否的方法是城市人口密度法。⑩ 鲍宁以近代化视

---

① 周琼《清代赈灾制度的外化研究——以乾隆朝“勘不成灾”制度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 年第 1 期。
② 叶瑜等《1801 年永定河水灾救灾响应复原与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 年第 4 期。
③ 成赛男、杨煜达《1840 年长江三角洲水灾的时空分布与社会响应》，《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 年第 1 期。
④ 陈亚平《保息斯民：雍正十年江南特大潮灾的政府应对》，《清史研究》2014 年第 1 期。
⑤ 袁飞《光绪三十二年苏皖水灾中的救济差异及皖北困境》，《清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
⑥ 吕君丽、陈恩虎《明清时期巢湖流域水资源环境与塘坝兴修》，《安徽史学》2014 年第 2 期。
⑦ 张健、张俊辉、吕卓民《1757—1911 年黄河中下游决溢与气候波动》，《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 年第 6 期。
⑧ 罗威廉《近代早期的中国城市》，《史学月刊》2014 年第 4 期。
⑨ 罗晓翔《明清南京内河水环境及其治理》，《历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
⑩ 张力仁《清代城市的空间范围及其人口属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 年第 5 期。

角，探讨了新式学堂建设对北京城市空间的改造，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文化、市民观念的变迁。①

医疗卫生史　杜丽红关注近代中国疫病防治状况，她讨论了政府应对1910年东北鼠疫措施——交通遮断背后隐含的复杂内容，指出交通遮断展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种政治势力既合作又斗争的过程以及清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② 单丽从认知史的角度，考察中医体系对于古典霍乱病因的认知及地方民众的霍乱病因感知。③ 李宏利探析了明清上海士人群体寿命状况及影响因素。④ 此外，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张瑞的博士论文《疾病、治疗与疾痛叙事——晚清日记中的医疗文化史》。⑤ 张仲民则利用清人的笔记、小说、报刊资料，探析了晚清上海药商的广告造假现象。⑥

妇女史　本年度妇女史研究的突出特点是从女性本位出发，强调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同时，“女学”、女子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之注意，并成为许多研究的切入点。李国彤《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跳出“受害者的手稿”之框架，关注妇女受教育的途径以及她们的学习内容和写作内涵如何影响到妇女觉醒，并总结了戊戌变法及20世纪初的社会动荡对中国女学的改造。吉晓华指出清末广东地区女子自梳风气盛行，与近代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机器缫丝厂的大量出现密切相关，女性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自我意识觉醒，开始反抗不平等的封建婚姻制度。⑦ 秦方以清末民初天津女学为切入点，审视近代女学师生如何借助女学这一途径实现其在地域、空间和身份认同上的移动和转变。⑧ 吴国荣考察了清末民初女子职业教育思想的嬗变，指出女子职业教育思想经历了发轫、曲折发展、逐渐成熟三个阶段，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女子职业教育思想的内涵由以“贤妻良母”为培养目标的“母职”教育观向以谋个性发展之“完全人格”为旨归的教育理念转化，现代女子职业教育思想体系基本确立。⑨ 宫宝利、万银红考察了晚清华北最大的社会经济慈善机构津河广仁堂中收养的节妇、恤女的生活，随着周学熙开办女工厂、女学堂等一系列堂务的整顿，她们的生活也被卷入近代社会转型潮流之中，从以重“养”为主转变为“教养并重”。⑩ 赵晓华则注意到清末民初几次兴起的女着男装现象，认为这既是国族危机下新女性的形象构建，也是性别解放思潮中女性主体意识的外化，体现了大众文化中不断变化的审美观念对旧伦理的冲击。⑪

人口史　薛理禹《清代人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厘清了清代人丁编审与丁银征收在立法层面的制度演变，着重分析了地方官府在执法层面对该项法规的实施，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从守法层面对该制度的响应等问题，并对清代“人丁”的实质含义赋予了新的阐释，认为其既不等同于成年男子，也不能笼统地概括为“赋税单位”，其含义必须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与时代背景加以判断。移民问题是人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媛、曹树基通过对浙江省松阳县

---

① 鲍宁《清末北京城庙产兴学与新式学堂建设》，《史学月刊》2014年第12期。
② 杜丽红《清末东北鼠疫防控与交通遮断》，《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
③ 单丽《清代霍乱病因认知（1820－1911）——以中医和地方文化为中心的考察》，《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第6期。
④ 李宏利《明清上海士人群体寿命探析——以墓志为中心》，《史林》2014年第6期。
⑤ 张瑞《疾病、治疗与疾痛叙事——晚清日记中的医疗文化史》，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⑥ 张仲民《晚清上海药商的广告造假现象探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第85期。
⑦ 吉晓华《从自梳女、金兰契看清末民初广东地区女性经济地位的变化》，《安徽史学》2014年第3期。
⑧ 秦方《清末民初女学师生的游移经验——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14年第1期。
⑨ 吴国荣《清末民初女子职业教育思想之嬗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⑩ 宫宝利、万银红《晚清津河广仁堂女性生活考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⑪ 赵晓华《清末民初的女着男装现象》，《求索》2014年第12期。

石仓阙氏的一份记录返回祖籍修建先祖香火堂之旅的路程账本《回闽路程》的细致解读，讨论了移民对于原乡远祖的血缘认同问题。[①] 姚远基于对华侨省籍分布差异成因的分析，比较了清末民初广东、江苏海外移民的不同。[②] 凌焰考察了清中期萍乡外来人员的入籍方式及过程，并重点讨论了义祠在移民入籍方面的功能。[③] 王跃生旨在讨论清政府针对民众自发性流迁所采取的措施，指出政府对民众自发性流迁行为实行了区别对待政策。在东北、台湾以控制进入为主，但非绝对封禁，南方山区基本采取允许棚民进入谋生的政策，四川、口外实行开放政策，湖北、湖南西部实行改土归流地区亦允许民众前往谋生。[④] 梁勇《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清代巴县为例》（中华书局），利用州县档案，构建了清代巴县地区以移民为中心的地方社会面貌，阐述了具有移民社会特色的保甲、客长、团正、学董、会馆等基层管理体制的演变，从而探讨移民与基层社会控制体系的关系。

日常生活与基层社会　村上正和《清代中国における演劇と社会》（山川出版社），以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演剧为考察中心，勾勒了当时都市演剧的实态，讨论通过演剧形成的社会关系等问题。刘永华通过解读新近发现的 13 册徽州文献排日帐，以个案考察的方式，探讨了近代乡民生活空间的基本结构及变化，并分析了相关的影响因素，指出晚清乡民的活动空间较大，空间流动性较高，而不是闭塞的。[⑤] 蒲乐安《骆驼王的故事：清末民变研究》（商务印书馆），对清末山东莱阳、直隶遵化、四川威远、广东连州、江苏川沙等地的民变进行了集中考察和分析，关注其背后共有的历史因素——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和关于以往反叛的历史记忆，从而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在清末新政背景下乡村社会发生危机的全景图。作者重新审视了乡村民变与晚清近代化的关系，认为应当把中国乡村的民变视为晚清近代化进程的一部分。

民间信仰　李平亮、赵鹏飞通过对清代萍乡许真君信仰的历史考察，探讨其背后所展现的图甲户籍、商人组织、科举功名与乡村社会权力体系演变的历史过程。[⑥] 小田考察了晚清江南乡村女巫在两个世界遭受的截然不同的境遇——普通民众尤其是乡村妇女的积极崇奉与政权精英的例禁，并剖析其反映出的两个世界的逻辑差异。[⑦]

宗族是基层社会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备受学者关注。本年度有关宗族的研究亦不在少数，其中又以徽州宗族研究成果最多，有黄忠鑫《明清徽州图甲绝户承继与宗族发展——以祁门瀛洲黄氏为中心的考察》[⑧]、李甜《“方德让家”：从旌德方氏看明清皖南宗族的家史编纂》[⑨]、徐彬、祝虻《清代以来徽州家族修谱谱局管理模式研究》[⑩]、张小坡《明清徽州村社运作与宗族关系初探》[⑪] 等，分别对宗族内部发展、宗谱修纂、宗族与地域权力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闽南宗族方

---

① 王媛、曹树基《〈回闽路程〉：香火堂与移民先祖之祭》，《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
② 姚远《清末民初广东、江苏海外移民比较研究——以华侨省籍分布差异成因为主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
③ 凌焰《再论清中期萍乡外来移民的入籍》，《史林》2014 年第 4 期。
④ 王跃生《清中期民众自发性流迁政策考察》，《清史研究》2014 年第 1 期。
⑤ 刘永华《从“排日账”看晚清徽州乡民的活动空间》，《历史研究》2014 年第 5 期。
⑥ 李平亮、赵鹏飞《清代萍乡许真君信仰的发展与乡村权力格局的演变》，《宗教学研究》2014 年第 2 期。
⑦ 小田《论江南乡村女巫的近代境遇》，《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5 期。
⑧ 黄忠鑫《明清徽州图甲绝户承继与宗族发展——以祁门瀛洲黄氏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2014 年第 6 期。
⑨ 李甜《“方德让家”：从旌德方氏看明清皖南宗族的家史编纂》，《安徽史学》2014 年第 3 期。
⑩ 徐彬、祝虻《清代以来徽州家族修谱谱局管理模式研究》，《史学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
⑪ 张小坡《明清徽州村社运作与宗族关系初探》，《安徽大学学报》2014 年第 6 期。

面，苏惠苹、潘淑贞均采用个案分析的方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① 北方宗族发展虽不如南方兴盛，但近年来亦得到不少学者关注，秦海滢《明清时期山东宗族分家析产与财产纠纷》②、王洪兵《清代华北宗族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以顺天府宝坻县为例》③ 分别对山东、河北宗族给予了讨论。

思想文化史研究

近代社会思潮　王宏斌阐述了“政体”、“国体”二词在古代典籍中的涵义及其在近代以来的词义嬗变，从中窥探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和文化转型。④ 雷颐对学界“从五四开始全面反传统”和“从五四起激烈反传统”的“定论”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现代思潮”奠定于戊戌—辛亥时期，而非五四时期。他在《“戊戌—辛亥思潮”与激烈反传统的完成》一文中指出，对中国传统的反思和批判，至少从戊戌就开始了，而到辛亥革命前其论述已经非常成熟，后来的“五四”反传统话语的广度、深度甚至激烈程度并未超越“戊戌—辛亥思潮”。⑤ 鲁法芹、蒋锐分别梳理了晚清时期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而产生的七种具有代表性的大同主张。⑥ 王艳勤从语义学和词源学角度，探讨了晚清民权思想的形成。⑦ 陆华东从晚清中国学习西方、国家建构及批判国民性等政治转型视角分析了当时公民教育思想兴起的原因。⑧

一些重要政治人物的思想也得到重新认识。在近代的各种观念中，“富强”观念无疑是一个重要议题，郭道平以郭嵩焘和严复为代表，讨论了他们关于西洋富强的认识异同及背后原因所在。⑨ 杨际开以宋恕、章太炎为代表，以十九世纪后半叶东亚变局中的浙学转型为视角，探讨了清末浙江籍志士的变法主张，指出他们的变法思想与康、梁不同，他们提出亚洲连带构想，章太炎进而将台湾置于其东亚联邦思想的中心，举起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旗帜。⑩ 董根明阐述了严复的进化史观及其对新史学的影响。⑪ 王玉玲认为康有为的“新中国”构想经历了三个时期，并考察了康心目中的“新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及演变。⑫ 陈健依据杨度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期间的课堂讲义，及反映其君主立宪思想的代表性长文《金铁主义说》，揭示留学教育对杨度君主立宪思想形成的具体影响。⑬

概念史　关于新名词研究，以秦方《新词汇、新世界：清末民初“女界”一词探析》、李玲《从刊报未分到刊报两分——以晚清报刊名词考辨为中心》为代表，前者以晚清出现的新词汇

---

① 苏惠苹《明中叶至清前期闽南海洋环境与家族发展——圭海许氏家族的个案分析》，《安徽史学》2014 年第 1 期；潘淑贞《清代以来闽南宗族与乡村治理变迁——以南安大庭戴氏为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4 年第 3 期。

② 秦海滢《明清时期山东宗族分家析产与财产纠纷》，《东北师大学报》2014 年第 3 期。

③ 王洪兵《清代华北宗族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以顺天府宝坻县为例》，《东北师大学报》2014 年第 6 期。

④ 王宏斌《“政体”“国体”词义之嬗变与近代社会思潮之变迁》，《安徽史学》2014 年第 5 期。

⑤ 雷颐《戊戌——辛亥思潮与激烈反传统的完成》，《历史教学》2014 年第 14 期。

⑥ 鲁法芹、蒋锐《晚清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与传统大同理想的激活》，《江汉论坛》2014 年第 9 期。

⑦ 王艳勤《晚清中国民权话语的形成》，《晚清中国民权话语的形成》，《江苏社会科学》2014 年第 6 期。

⑧ 陆华东《晚清中国政治转型与公民教育思想的兴起》，《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 年第 6 期。

⑨ 郭道平《19 世纪后期关于“富强”的本末观——以郭嵩焘和严复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14 年第 2 期。

⑩ 杨际开《清末浙学志士的变法思想》，《浙江社会科学》2014 年第 4 期。

⑪ 董根明《严复的进化史观及其对新史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4 年第 6 期。

⑫ 王玉玲《康有为“新中国”构想的历史演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 年第 7 期。

⑬ 陈健《杨度君主立宪思想论解——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教育影响为中心》，《史林》2014 年第 2 期。

“女界”为切入点，探讨近代中国女性在国家民族话语、两性关系和中国传统精英文化等脉络互动中形成的身份建构和认同。① 后者考察了晚清“报纸”、“杂志”等报刊新名词的起源、传播和定型，梳理了近代中国报纸杂志由一元概念到二元概念的变迁。② 段怀清尝试厘清晚清首位新教来华传教士马礼逊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使用“literature”一词的开始时间、使用语境、使用原因、具体指涉和内涵、影响等诸多问题。③ 朱文亮考察了辛亥时期“民军”称谓的演进和意义，并从“民军”的政治意义出发，进而讨论清帝逊位诏书的性质问题，对以往学界的若干说法提出了新的见解。④

认知史与阅读史　近年来，认知史、阅读史等较为新颖的研究领域逐渐兴起。贾小叶《论清人对台湾地位认知之变迁（1661—1875）——以官方为中心》是认知史的代表作，该文对有清一代清人对于台湾地位的认知做了一个长时段的考察，揭示其变迁的历史过程。清前中期，清人思考台湾问题的出发点在于“靖边患”。晚清以降，尤其是在日本的入侵下，台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以与人”的认知成为共识，清政府的台湾政策亦由“番界”转变为“开山抚番”。⑤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是一部阅读史专著，以个案形式阐述了晚清士人寻觅接受“西学”的读书历程。

清代学术思想与学人交游　张瑞龙《天理教事件与清中叶的政治、学术与社会》（中华书局）则以天理教事件及其对清代中叶社会、士风、学术的多重影响为中心，试图将政治史重新纳入思想史研究脉络，并着重强调“嘉道”作为一个独立学术研究单元的可能。王惠荣将关注点放在了乾嘉以后的道光汉学上，指出此一时期汉学虽不如乾嘉时期兴盛，却进入了另一个发展阶段，呈现出地域扩展至全国，新研究领域的开拓，由汉宋之争走向汉宋调和的新特征，并以新的方式影响着晚清学术。⑥ 于祥成探究了清代书院儒学的传播途径，主要有日常讲学、藏书刻书、书院祭祀、环境熏陶等。⑦ 陈居渊从学术层面对清代经筵讲论进行了研究，认为经筵讲论本身具有传统儒学与经学的双重特性，它既是清代礼制文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清代学术多变的主要动因。⑧

清代学人的交游活动也成为学者考察的一个重要方面。吴强华以晚清规模最大、持续活动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大的南社士人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其结社活动，探究传统士人在近代化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及身份认同构建等问题。⑨ 岳爱华通过李慈铭的日记，梳理了李慈铭与晚清士人书籍往来的具体情形和内容。⑩ 吴龙灿则从尊经书院时期、廖平早期经学时期和张之洞《劝学篇》面世之后等三个阶段考察了张之洞与经学家廖平师生的学术交往与新经学建构历程，与以往学者多强调二人学术之异相反，作者认为二人学术实质相同，共同建构了立法后世的以

---

① 秦方《新词汇、新世界：清末民初“女界”一词探析》，《清史研究》2014年第4期。
② 李玲《从刊报未分到刊报两分——以晚清报刊名词考辨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3期。
③ 段怀清《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语境中的“literature”概念——以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为中心》，《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④ 朱文亮《辛亥鼎革之际“民军”称谓考略——兼论清帝逊位诏书的性质》，《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
⑤ 贾小叶《论清人对台湾地位认知之变迁（1661—1875）——以官方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⑥ 王惠荣《试论道光年间的汉学》，《历史档案》2014年第1期。
⑦ 于成祥《清代书院儒学传播途径探微》，《湖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⑧ 陈居渊《清代的经筵讲论与学术的多变》，《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3期。
⑨ 吴强华《近代江南士人社群交往网络的营建与运作——以南社为中心》，《史林》2014年第4期。
⑩ 岳爱华《从〈越缦堂日记〉看李慈铭与晚清士人的书籍往来》，《历史档案》2014年第3期。

“中体西用、守约固本”为主旨的新经学体系。① 孙卫国研究了道咸时期清朝学人张曜孙与朝鲜通译李尚迪的交游，指出此一时期中朝学人的交往体现出群体性和家族性的特点，表明中朝文化交流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②

科举与学术　马子木系统考察了翻译科举的产生及制度化历程，分析了该制度对清朝满蒙官员群体形成的作用及其与清朝中期政策走向的关系。③ 宗韵专门考察了康雍乾时期科举考试中的恩科制，并从康熙朝文教“日盛”引发的矛盾分析入手，探讨了清代恩科设置的立意，康雍乾恩科运作程序的调整与倾向，恩科制下清代科举功能的嬗变及教育危机的加剧等问题。文章认为恩科制的实施，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科举控制社会之强力，但同时也使得传统科举的根本功能——选贤任能作为交换而被牺牲。④ 陈志辉以乾嘉天算专门之学在科举考试中的渗透，揭示了科举考试与乾嘉学术的内在联系。指出看似僵化的科举考试，其实却常与不同时期的文化、学术相联系，尽管康熙帝曾禁止以天文算法命题，但乾嘉天算专门之学依然影响到各级科举考试，不仅出现在试题、答卷中，还成为对考生学问进行评判的重要标准之一。⑤ 李世愉从制度层面考察了清代会试中额与登科进士人数往往不一致的原因所在。⑥ 何绵山研究了清代台湾科举，指出清代福建省治下台湾的科举考试，是按福建一个府的科举考试要求进行的，他介绍了清廷对台湾考生在名额上采取的优惠政策及为保证台湾科举顺利举行而采取的具体措施。⑦ 张献忠从道统和政统角度，研究了废科举的影响，认为科举的废除导致了道统的断裂，而道统的断裂又导致了政统的失序。⑧

边疆民族史研究

从整体和宏观角度探究清代的治边政策和管理实践，是学界亟待用力的研究目标。濮德培以18世纪清廷对青海、吐鲁番的政策为例，讨论了清代边疆政策的实施，即边疆政策如何转化为行政实践及如何被边疆地区接受的相关问题，并分析了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关系。⑨ 刘正寅《清朝前期民族观的嬗变》、祁美琴《清代宗教与国家关系简论》分别对清朝在边疆地区的民族、宗教政策做了总结性研究。前者分四个阶段论述了从努尔哈赤建国至乾隆朝近两百年间清统治者的民族观及其嬗变。⑩ 后者主要论述了清朝宗教政策产生的基础及其实践，各类宗教在清代国家进程中的角色和影响，并分析了清朝宗教与国家关系的实质，指出清廷对各类宗教基本采取一种政治功利化的态度，从而使得统治者不为某一种宗教所控制，各教派的兴衰基本限制在皇权之下。⑪

新疆与西北是近年来边疆民族研究的热点，本年度亦不例外，相关成果不断涌现，且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职官研究，如刘文鹏《清代南疆办事大臣职权考》，刘传飞《清代新疆建省前镇迪道

---

① 吴龙灿《风云际会的晚清新经学转型——张之洞与廖平的师生交往及其学术史意义》，《武汉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② 孙卫国《清道咸时期中朝学人之交谊——以张曜孙与李尚迪之交往为中心》，《南开学报》2014年第5期。
③ 马子木《论清朝翻译科举的形成与发展（1723—1850）》，《清史研究》2014年第3期。
④ 宗韵《恩科制、科举功能嬗变与清代教育危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⑤ 陈志辉《乾嘉天算专门之学在科举考试中的渗透》，《清史研究》2014年第3期。
⑥ 李世愉《清代会试中额与登科进士人数之关系》，《厦门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⑦ 何绵山《福建省治下的清代台湾科举》，《海峡教育研究》2014年第1期。
⑧ 张献忠《晚清主流意识形态危机和道统之断裂——以废科举为中心的考察》，《河北学刊》2014年第6期。
⑨ 濮德培《比较视野下的帝国与国家：18世纪中国的边疆管辖》，《史学集刊》2014年第4期。
⑩ 刘正寅《清朝前期民族观的嬗变》，《史学集刊》2014年第4期。
⑪ 祁美琴《清代宗教与国家关系简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部分职官、建置考》，王超《从印信变化看乾隆朝总理各回城事务参赞大臣的设立》、《清代总理各回城事务参赞大臣驻地迁移探析》，鲁靖康《清代侍卫新疆史迹考》，均将关注点放在清代新疆职官考察之上。①

第二，司法制度研究，白京兰分别考察了清代新疆伊犁、塔城地区，乌鲁木齐及吐鲁番、哈密地区，回疆地区的司法机构与职能行使，并总结了军府体制下新疆司法体系及运作的特点，即军府衙门为主导的多元性，各驻扎大臣衙门司法权力的行使相对独立且各自为政，多元司法权力的行使在地方层面缺乏有效监督。② 王东平致力于清代天山南路地区的法律史研究，力作频出，如对清代天山南路地区的刑案现场勘验人物群体的研究、对清代天山南路穆斯林社会民事纠纷的审理案件的研究、对清代天山南路地区的钱币私铸问题的研究等③，将相关研究不断推向深入，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和认识清代南疆社会。

第三，基层管理研究。李元斌探究了国家如何"内化"于边疆及边疆民族的回应，指出清朝在建立"回屯"的过程中再造了伊犁维吾尔人的"乡土社会"，继而将国家权力下移至此，使人们感受到"国家在场"的力量，从而产生身份认同。④ 李德政则从户籍、租税制度与基层组织的互动关系角度考察了伊犁回屯，指出回屯合三者于一体，实现了基层社会控制的一元化格局。⑤

第四，边疆防御研究。陈剑平分析了清代新疆卡伦的体系构成，指出统称的"卡伦"体系实际包括卡伦、布克申、安达兰、塔布图、察克达、其他小卡伦及开齐等众多机构与设施，并对它们的音义、分布、功能等进行了一一阐述。⑥ 杨军民以陕甘总督与新疆各军府关系为视角，考察了清代西北边防体系，指出清代西北边防有三层，由外而内分别为"西北新月型"封贡体系、乌里雅苏台将军和伊犁将军所辖各军府、陕甘总督及所辖行省，其中，陕甘总督及所辖陕甘两行省为西北边防战略基地和战略支撑，陕甘总督与伊犁将军之间相互依存、相互配合，共同保证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安全。⑦

西南边疆研究中，藏族的宗教、藏区与国家关系仍然是关注的重点。尕藏加的《清代藏传佛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是清代藏传佛教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利用丰富的藏文、汉文史料，对清代藏传佛教的发展、流布和演变进行了系统研究，内容包括藏传佛教的派系、经典文献、教理学说、仪轨制度，以及政教合一制度、活佛转世制度、金瓶掣签制度、册封赏赐制度、度牒制度、僧团管理方式等等。王娟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改土归流"——清末川边康区的"改土归流"为重要考察节点，以"流官进入边疆"为主线，以县级行政官员之遴选与培养为切入点，探究川边康区被一步步纳入现代国家同一化行政体系的过程。作者指出，贯穿这一过程的主线是国家始终试图将"土著精英"改造为"国家官员"，这种做法

---

① 刘文鹏《清代南疆办事大臣职权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 年第 1 期；刘传飞《清代新疆建省前镇迪道部分职官、建置考》，《西域研究》2014 年第 2 期；王超《清代总理各回城事务参赞大臣驻地迁移探析》，《史学集刊》2014 年第 2 期；鲁靖康《清代侍卫新疆史迹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4 年第 4 期。

② 白京兰《军府体制下清代新疆的司法体系及运作》，《西域研究》2014 年第 3 期。

③ 王东平《清代天山南路地区的刑案现场勘验人员》，《西域研究》2014 年第 3 期《清代天山南路穆斯林社会民事纠纷的审理——以色提巴尔第家人遗产纠纷案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 年第 2 期《清代天山南路地区的钱币私铸案》，《新疆大学学报》2014 年第 1 期。

④ 李元斌《国家、乡土与族群——清代伊犁维吾尔人的历史人类学解读（1760—1860）》，《新疆大学学报》2014 年第 3 期。

⑤ 李德政《清代伊犁回屯的户籍租税制度与基层组织》，《中国农史》2014 年第 1 期。

⑥ 陈剑平《清代新疆的卡伦体系构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4 年第 4 期。

⑦ 杨军民《清代陕甘总督与新疆军政治理——以陕甘总督与新疆各军府关系为视角》，《鲁东大学学报》2014 年第 4 期。

虽然有违流官制度的根本属性，却成为国家力量进入具有深厚地方传统的边疆地区的必然选择。① 扎洛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视角，以赵尔丰在康区的法制改革为侧重点，考察了清代藏区的法制背景，赵尔丰法制改革的内容、方式、具体过程及其效果，指出其试图建立统一国族认同、一体化政治法律制度的改革，带有明显的模仿、移植色彩，影响十分短暂，虽然符合当时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潮流，但尚未找到适合中国国情、充分兼顾各地方、各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法制建设道路。② 王林敏通过对清代处理藏区赔命价的研究，阐述了清代处理赔命价的立法、司法模式，即将赔命价纳入国家法制，利用土司制度解决藏区私人相犯的刑事案件，使赔命价成为藏区社会稳定的有益因素。③ 同期，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也再次受到学界的重视。贾霄锋、方铁、李世愉等人于本年度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引人注目。④

其他边疆地区的研究成果较为零散。齐光利用蒙古文、满文档案史料，阐释了蒙古阿拉善和硕特部服属清朝的详细过程及康熙朝前半期的西北边疆政策。⑤ 金鑫利用满文公牍材料，结合汉文文献记载，对康熙朝组建的黑龙江驻防八旗“穷索伦”、站丁牛录进行了考察，包括其组建缘由、始末经过、驻地和建制的调整定型过程、清廷在生计上的扶持措施等。⑥ 张中奎专注于清朝治理苗疆政策的研究，阐述了清廷开辟、改造“新疆六厅”，使苗疆从“新疆”到“旧疆”，再到“腹地”的过程。⑦ 另一文则梳理了清政府苗疆土地政策的演变，尤其是咸同“苗乱”前后土地政策的转变。⑧ 陈文祥则注意到回民起义军的眷属群体，阐述了其从留守到随军的安置策略之演变、清政府对他们的处置措施以及其对起义军决策之影响。⑨ 刘晨曦、吴丽华考察了黑龙江站人的社会地位与群体意识。⑩

此外，边疆历史地理研究呈现出活跃的态势。吴承忠等人利用蒙汉史料考证了清代黑界地的由来及范围，尤其是厘清了“伙盘地”、“牌界”、“牌界地”等相关概念。⑪ 李花子通过档案资料和实地勘察，考证了康熙五十一年中朝间定界标志黑石沟土石堆的位置。⑫ 胡恒指出以往将南雅视为清代台湾最后一个厅的建置之认识是不对的，南雅同知之设并不符合厅的标准，只是带有治安等局部职能的分防同知，清代台湾不存在作为政区的“南雅厅”。⑬ 杨斯童考察了西北边疆的拓殖与开发史，指出其经历了由“西域”到“西北”的变化，这不仅是指称上的改变，其实质是“西北”边地内化为“中国”国土的一部分，“西北”成为“中国”的西北。⑭ 席会东利用清代古地图解读了清政府、准噶尔汗国、清朝官员学者三种不同主体的西域观。其中，康雍乾时期清廷采用西方近代测绘技术绘制的“皇舆全图”系列舆图展现了清代新疆的现实情形，《乾隆

---

① 王娟 《流官进入边疆：清初以降川边康区的行政体制建设》，《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 年第 1 期。
② 扎洛 《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赵尔丰在康区的法制改革》，《民族研究》2014 年第 2 期。
③ 王林敏 《清代处理藏区赔命价的模式及其现代启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4 年第 2 期。
④ 贾霄锋 《试论明清时期藏族土司地区的社会管理体系》，《青海民族研究》2014 年第 2 期；方铁 《土司制度与元明清三朝治夷》，《贵州民族研究》2014 年第 10 期；李世愉 《土司制度基本概念辨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 年第 1 期。
⑤ 齐光 《蒙古阿拉善和硕特部的服属与清朝西北边疆形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 年第 1 期。
⑥ 金鑫 《康熙朝黑龙江驻防八旗“穷索伦”、站丁牛录考》，《民族研究》2014 年第 5 期。
⑦ 张中奎 《清代苗疆“国家化”范式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4 年第 3 期。
⑧ 张中奎 《清代苗疆土地政策的嬗变与帝国权威的下移》，《吉首大学学报》2014 年第 4 期。
⑨ 陈文祥 《清代回民起义军眷属问题探析——以乾隆、同治朝西北回民起义为中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4 年第 5 期。
⑩ 刘晨曦、吴丽华 《清代黑龙江站人社会地位与群体意识》，《北方文物》2014 年第 2 期。
⑪ 吴承忠、韩光辉、舒时光 《清陕蒙黑界地的范围研究》，《中国农史》2014 年第 5 期。
⑫ 李花子 《黑石沟土石堆考》，《清史研究》2014 年第 1 期。
⑬ 胡恒 《清代台湾“南雅厅”建置考》，《台湾研究集刊》2014 年第 3 期。
⑭ 杨斯童 《从“西域”到“西北”——西北边疆拓殖与开发的历史启示》，《东北师大学报》2014 年第 6 期。

内府舆图》更是彰显了教化“番夷’‘天下一统”的王朝西域观和疆域观；清中后期官员学者采用中国传统绘图方式测绘的新疆图籍体现出将新疆纳入中国传统史志文献和知识体系的价值取向；两者共同彰显了清代统一新疆的文治武功。而准噶尔汗国受清朝和沙俄双重影响绘制的《准噶尔汗国图》反映出的则是以西域为中心的疆域观和民族观。①

边疆社会与习俗研究方面，李思睿、李良品考察了清代贵州民族地区民间慈善事业的相关情况，包括创办缘由、经费来源与救济标准、管理方式等。② 何一民、赵淑亮论析了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地区存在的多种婚姻家庭形态。③ 吕萍介绍了清代东北少数民族恰喀拉人及其分布、社会组织、经济活动、衣食住行、教育与宗教等社会与文化情况。④ 刘继华则对学界研究较为薄弱的近代宁夏基督教传播史进行了系统梳理。⑤ 陆吉康、段艳研究了晚清鸦片对贵州民族风俗的影响。⑥ 刘小萌以清代文献为基础，从姓氏、名字、字与号、辈字排名、法名、避讳用字、更名冠姓等七个方面对满人姓氏命名系统的内容、特点、演变做了全面考察。⑦

一些学者利用西人的记录描述边疆民众的生活习俗。王志佩、管守新《晚清民国时期中外旅行家笔下的哈密社会》，通过阅读晚清民国时期旅行新疆的各类人群如清朝官员、国外探险家、科学考察团成员等的记述，从居民、建筑、饮食风俗、教育四个方面勾勒出哈密的社会生活风貌。⑧ 此外，还有马建春、徐虹的《明清时期西方人载记中的中国清真寺院》、《西人笔下明清中国穆斯林的社会特征与文化风俗》。⑨

学术动向与热点追踪

纵观 2014 年度的清史研究，在回顾与总结的基础上，由于新史料、新视角、新方法的大量引入，使传统研究领域出现新气象，尤其是史料的多元化成为未来研究追求的方向。

这一方面表现为多种语言文字史料的对勘和互相印证，如邱涛、郑匡民《庚子肃王府之战》即运用了中、日、英档案的互证。而在各种文字的史料中，满语、满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学界对于满语、满文的关注、研究与利用逐渐升温。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为例，为推动满文档案的整理与运用，培养满文翻译、研究人才，该所满文文献研究中心不仅于当年 11 月召开“人物·族群·制度——多元视角下的满文文献”学术研讨会，还与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签订“满族·锡伯族历史文化传承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协议”，这些活动正是这一学术动向的集中反映。学界的相关成果，如马腾《“十二字头”与清代满文语学》⑩、刘宇、张松《清朝时期满语的国际传播》⑪、张军《满族的语言认同与清末“国语”转型》⑫ 等都是对满语满文的研究。而运用满文资料诞生的新观点、新认识更多，定宜庄在《关于清代满族妇女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

① 席会东《清代地图中的西域观——基于清准俄欧地图交流的考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 年第 6 期。
② 李思睿、李良品《论清代贵州民族地区民间慈善事业》，《贵州民族研究》2014 年第 10 期。
③ 何一民、赵淑亮《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地区多种婚姻家庭形态论析》，《贵州民族研究》2014 年第 8 期。
④ 吕萍《清代恰喀拉人的社会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4 年第 2 期。
⑤ 刘继华《晚清时期宁夏基督教传播史考述》，《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4 年第 2 期。
⑥ 陆吉康、段艳《晚清时期鸦片对贵州民族风俗影响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4 年第 5 期。
⑦ 刘小萌《清代满人的姓与名》，《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4 年第 1 期。
⑧ 王志佩、管守新《晚清民国时期中外旅行家笔下的哈密社会》，《新疆大学学报》2014 年第 1 期。
⑨ 马建春、徐虹《明清时期西方人载记中的中国清真寺院》，《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4 年第 4 期；马建春、徐虹《西人笔下明清中国穆斯林的社会特征与文化风俗》，《回族研究》2014 年第 2 期。
⑩ 马腾《“十二字头”与清代满文语学》，《清史研究》2014 年第 3 期。
⑪ 刘宇、张松《清朝时期满语的国际传播》，《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 年第 4 期。
⑫ 张军《满族的语言认同与清末“国语”转型》，《社会科学家》2014 年第 3 期。

一文中，特别强调满文史料的重要价值，并且指出在运用满文史料时，不应将其仅作为汉文史料的补充，应关注名词的不同导致的概念、观念上的差异。① 江桥《“父汗”、“汗父”辨——读〈无圈点档〉及其抄本札记》，也是在考证满文“父汗”、“汗父”二词出现的时间、应用上的差异与变化，透析其中反映的社会关系之演变，指出从“父汗”到“汗父”的变迁，表明在人们的观念中“汗”权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血缘关系，亦反映了满洲入关前社会组织从家族、部落联盟迅速进入帝制国家的过程。② 孔源对“dergi”一词在满文文本中的多层含义及词义变化进行了释读，进而探究历史上满族政权崇尚东方的观念。③ 齐光通过解析乾隆年间摹绘的《皇清职贡图》绘卷及其满汉文图说，阐述了清朝与各“民族”、“国家”关系的实质，探讨清朝对国内各“民族”、各“集团”的统治政策以及其自身的政权属性问题。④ 乌仁其其格《内蒙古人口档案中的边疆村落社会——以察素齐为例》，主要利用满文丁册档案，考察了清末察素齐村的蒙古族人口与社会风貌。⑤ 卢正恒、黄一农利用数字化手段，系统爬梳整理出大量满、汉文第一手史料和文物，对努尔哈赤时期至皇太极称帝前的国号进行了新的考察，确认当时国号始终为“金”，没有“后金”一说，“天命”也并非年号。⑥

另一方面表现为史料类型、来源的多样性，相片、绘画、地图、物品等多种形式的资料经常见于学者的著作中。而由于近年来地方档案、民间文献的不断发掘和开放，地方史、基层社会史、民众生活史的研究随之增多，如梁勇《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清代巴县为例》、张晓霞《清代巴县档案中的“休妻”与“嫁卖生妻”》⑦ 均是基于巴县档案的考察。这些新史料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修正、补充了以往的研究，推动了清史研究的进一步开拓和深入。

此外，本年度的清史学界，有关“新清史”的讨论仍在继续。代表性的观点主要集中于汪荣祖主编的《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台湾中央大学出版中心、远流出版公司）论文集中，汪荣祖、杨念群、吴启讷、甘德星、崔岩、叶高树、定宜庄、徐泓等学者从文化、族群、认同、制度等多角度回应了“新清史”。《民族研究》刊发的戴海斌《“种族”与政治：晚清宗室寿富之死及其回响》一文，亦是对“新清史”的有力回应。作者否定了“新清史”学者路康乐将寿富视为种族主义者，其关于甲午战后中国危机的言论并非从所有中国人，而是从旗人自身利益出发的观点，指出寿富的关心焦点在一朝一国之变法图存，非为“种族”问题，其中体现的新旧之争高于满汉之别。戊戌以前满汉之间的“种族”之见和“种族”之界并没有后来排满革命家宣传的那条不可逾越的鸿沟。⑧ 期待这样的讨论，能在客观与理性的道路上前行。

青年是学术进步的未来，博士学位论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界关注的热点和趋向。所以在文章的最后，笔者将能够收集到的本年度清史研究领域的博士论文罗列于此，供同人参考。

杨春君《钦差与清代政治变迁（1644—1850）》（南开大学），王海明《晚清奏销制论略》（吉林大学），赵鲁臻《危机下的变革：晚清陆军战术及训练研究——以湘军、淮军与新建陆军为中心的讨论》（南开大学），丁业鹏《清末国会请愿运动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塔丽婷《清末民初的东三省地方议会研究》（吉林大学），刘鹏超《奕劻贪污与晚清政局——以弹劾奕劻案为中心的考察》（南开大学），王俊桥《晚年郭嵩焘研究》（南开大学），王晓红《跨文化视角下

---

① 定宜庄《关于清代满族妇女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4 年第 6 期。
② 江桥《“父汗”、“汗父”辨——读〈无圈点档〉及其抄本札记》，《历史档案》2014 年第 4 期。
③ 孔源《从“derigi”一词看历史上满族政权崇尚东方的观念》，《史学月刊》2014 年第 4 期。
④ 齐光《解析〈皇清职贡图〉绘卷及其满汉文图说》，《清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
⑤ 乌仁其其格《内蒙古人口档案中的边疆村落社会——以察素齐为例》，《清史研究》2014 年第 1 期。
⑥ 卢正恒、黄一农《先清时期国号新考》，《文史哲》2014 年第 1 期。
⑦ 张晓霞《清代巴县档案中的“休妻”与“嫁卖生妻”》，《甘肃社会科学》2014 年第 2 期。
⑧ 戴海斌《“种族”与政治：晚清宗室寿富之死及其回响》，《民族研究》2014 年第 3 期。

的晚清留英学生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刘成峰《明清之际中西文化在福建的博弈——以文人群体对天主教的认知为中心》（福建师范大学），杨秀云《赫德与晚清中外约章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朱琳《乾嘉道时期淮河流域粮价研究（1736—1850）》（南开大学），杨蕊《清代陕西食盐产销问题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彭志才《清代以来江西地区社会经济若干问题研究（1723—1964）——以江西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为中心》（河北大学），张瑞《疾病、治疗与疾痛叙事——晚清日记中的医疗文化史》（南开大学），张博《清代士人的生活世界——关于三位士人日常生活的研究》（南开大学），万银红《清代妇女社会活动研究》（南开大学），韩荣荣《雍乾女性词人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刘菲《清前期皇室及贵族服饰研究》（山东大学），韩佺《清代皇族女性墓葬研究》（南开大学），王民德《晚清碑学思潮研究（1814—1911）》（中国艺术研究院），王舒雅《太平天国公文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岳永《清代笔记观初探》（华东师范大学），马晓粉《清代云南会馆研究》（云南大学），张晓婧《清代安徽书院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程俊《归绥地区回民研究（1632—1937）》（内蒙古大学），李德新《清前期东北流人研究（1644—1795）》（东北师范大学），刘刚《顺治朝东北贰臣流人和方外流人研究——以陈之遴和苗君稷为个案的考察》（东北师范大学），刘杰《清代河套地区民族间的民间交往研究》（宁夏大学），褚宏霞《清代边疆移民的落籍方式研究——以新疆、内蒙古、东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中国人民大学），詹夺《清末新政时期东三省蒙务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孙赫《清代东北边疆卡伦及其管辖研究——以“卡伦界”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李晓标《晚清西方人眼中的蒙古——以西文地图与游记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张公政《清代东北海疆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刘耀《晚清台湾海防建设研究》（武汉大学），施剑《清代浙江省政区边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王大文《文献编纂与“大一统”观念〈大清一统志〉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沈伟《清代私修类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陈小洁《中国传统司法判例中的情理表达——以清代《刑案汇览》为对象的分析》（东北师范大学）。

由于笔者水平所限，所概述的内容或有遗漏和不妥之处，还请同人谅解。此外，本文“学术活动评述”部分参考了2014年度电子刊物《清史研究国际通讯》相关信息，特此致谢。